

福建方言熟语歌谣丛书

◆ 陈泽平 主编

莆仙方言 熟语歌谣

(新编)

刘福铸 编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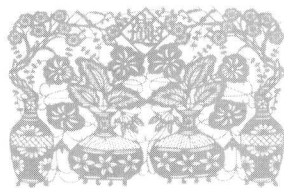


福建人民出版社

福建方言熟语歌谣丛书

莆仙方言 熟语歌谣

刘福铸 编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莆仙方言熟语歌谣/刘福铸编著.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7. 7

(福建方言熟语歌谣丛书)

ISBN 978-7-211-03903-6

I. 莆... II. 刘... III. ①闽南—熟语—莆田市
②民歌—作品集—莆田市 IV. ①H177.2②
I277.25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22301 号

福建方言熟语歌谣丛书

莆仙方言熟语歌谣

PUXIAN FANGYAN SHOUYU GEYAO

作 者: 刘福铸 编著

责任编辑: 陈力凡

出版发行: 福建人民出版社 电 话: 0591—87533169(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fjpph.com> 电子邮箱: 211@fjpph.com

地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邮政编码: 350001

印 刷: 福建新华印刷厂

地 址: 福州市福新中路 42 号 邮政编码: 350011

开 本: 850×1168 1/36

印 张: 9.111

插 页: 2

字 数: 215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

书 号: ISBN 978-7-211-03903-6

定 价: 21.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总 序

陈泽平

熟语歌谣中蕴涵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凝聚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智慧、劳动经验、社会习俗和情感体验，在民俗学、语言学、文艺学、社会学等学科上都具有极大的研究价值。

早在 1921 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就率先进行了民间歌谣的调查研究工作。北京大学成立了歌谣研究会，出版了《歌谣》会刊，分期发表收集到的各地歌谣和研究讨论的文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人民政府十分重视民间文化遗产的发掘和继承，在上一世纪 50 年代和 80 年代都组织了民歌的收集工作，成绩显著。但有两个方面的制约使这两次大规模的“采风”成果未能尽如人意：一个是当时极“左”的文艺思想误导了具体负责采集整理工作的基层文化组织。尤其是在五六十年代，片面地用阶级分析的观点来指导工作，许多熟语歌谣的内容被认为“愚昧、落后、迷信”或“低级趣味”被排除在采集范围之外，而一些有明显伪造痕迹、实际上是宣传口号、宣传打油诗一类的东西因为能迎合主事者的需要，却塞了进去。所谓“大跃进歌谣”就是这样的东西。80 年代的“民间文学三集成”项目的汇编材料中，仍然可以看到这种影响。其次，是技术上的问题，由于方言记写的困难，收集材料时容易产生偏差。例如记写方言词的用字比较混乱，许多方言词语不

◎ 总

序

好写就较随意地用普通话翻译代替了，记下的方言词语注释不全或偏颇，使得最终整理出来的材料失去了很大一部分学术价值。如果说，这些材料在熟悉本地方言的读者看来还差强人意，不会说该地方言的读者就无所适从了。

技术上的问题其实也是项目组织者认识上的问题。方言熟语歌谣属于下里巴人，但将它作为文化遗产进行收集整理却是很专门的研究工作，没有一定的专业训练和较高的文化修养是做不好这项工作。明代杨慎编《古风谣》，冯梦龙编《山歌》，清代李调元编《粤风》，杜文澜编《古谣谚》，都是名家。五四时期《北京大学日刊》上刊发的歌谣选由沈尹默和周作人主持，“刘复担任来稿之初次审定并编辑汇编，钱玄同、沈兼士考订方言”（周作人《一点回忆》，《民间文学》1962年第六期），全都是名重一时的顶尖级学者。而我们在80年代组织这项工作时，却仍然是“领导挂帅、发动群众”的老路子，由市县乡镇的行政长官挂名，具体工作交给整体上文化程度不高、专业素养不足的基层文化馆人员去做。尽管有些工作人员热情很高，熟悉当地的风土人情，收集了很多资料；但缺乏专业指导，在记录和推理方面力不从心，作为最终成果的汇编资料不能达到预期的质量要求，可以正式出版的寥寥无几。

福建省是闽方言和客家方言的分布区域，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方言熟语歌谣蕴藏丰富，等着我们去收集整理。但闽、客方言又是与普通话差异最大的方言，并且从未有过较为完整的书面表达手段，方言熟语歌谣的收集整理难度特别大。笔者在评估以往工作的基础上，从材料筛选、标音、用字、注释几个方面讨论如何整理方言熟语歌谣资料。

一、材料筛选

田园调查工作的原则是不抱先入之见，仔细调查，忠实记录，材料多多益善。但整理过程中却要做好分析、比较、鉴别、筛选的工作。

早在上世纪 20 年代，沈兼士先生在给顾颉刚先生的信中就提出必须区分“自然民谣”和“假作民谣”。他说：“民谣可以分为两种：一种为自然民谣，一种为假作民谣。二者的同点，都是流行乡里间的徒歌。二者的异点，假作民谣的命意属辞没有自然民谣那么单纯质朴，其调子也渐变而流入弹词小曲的范围去了。”

笔者认为，鉴别真假民谣首先是审看歌谣的语言。真民谣语言质朴、俚俗，它的自然的律是在口口相传中洗练出来的，没有雕琢的痕迹。通篇应当是流畅如话，纯粹的口语风格。而所谓假民谣其实是佚名作者的打油诗，或民间艺人的唱词，为凑成七言一句，两句一对的格式，往往用词要夹文夹白，杂进一些口语中不说的文言词。用同样的语言标准也可以将真正的谚语和文人创作的警句区别开来。

其次，真正的民谣应当是流行区域内民间风俗文化自然孕育出来的，有深厚的民众基础，这一点正是它们的特殊价值所在。有些属于个人的创作，如方言打油诗之类，虽然敝帚自珍地保存了下来，或在亲友之间小范围地传抄，艺术价值姑且不论，其社会文化价值毕竟很有限，不能跟真正的民间歌谣相提并论。因此，应当把是否具有相当的普及性作为筛选条件之一。

口口相传的熟语歌谣往往会形成好几个大同小异的“版本”，作为原始资料自然应该有闻必录，兼收并存，在整理过程中却要通过比较鉴别，选择“善本”。明显是由于讹误、混杂或次序颠倒的“版本”应该剔除，难

以判别的“版本”可以将其中有差异的部分摘录下来作为“善本”的附录。有的歌谣在传唱中衍生成内容和格式都“小同大异”另外一首或数首，这正是歌谣创作的自然过程，当然又当别论。

二、方言用字

辑录方言资料，用字是个回避不开的难题。闽方言的书面表达比起吴粤等方言，这个困难更突出一些。据统计，北京大学的歌谣研究会头三年间收集到的各地歌谣共有 13339 首，其中采自福建的仅占 54 首，发表了 25 首，数量显得特别少。在种种可以想见的原因里，闽方言难以记写恐怕是最重要的原因。

以往坊间印行的或以手抄形式流传的方言文学资料中用字十分混乱，不仅不同的收集整理者用字习惯不同，而且往往同一人记录下的材料中，对同一个词上文写了甲字，下文又写乙字。最糟糕的做法是以“整理”为名，碰到不懂怎么写的方言词就任意替换成书面词语，有的甚至把整个句子用夹生的普通话重新改造了。这种记录不是记录，翻译不成翻译的东西实际上没有什么价值，甚至会让不明底细的读者产生误会。

清代以来一些学者致力于考求方言本字，例如杨恭桓的《客话本字》，章太炎的《新方言》等。他们的方法不很科学，只要方言中某个词语与古代典籍的某个字的音义有些相似，就靠标准十分模糊的“一音之转”联系起来，认为就是本字。这样考求的结果，大半是经不起验证的。近年来，方言学者用历史比较的方法进行更为周密谨慎的研究，为一批方言口语词找到了比较可靠的词源，他们的研究成果为我们今天用汉字记写方言资料以及分析方言词的意思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但方言本字的考释还是存在大片的空白，仍有许多口语常用词目

前还不能有把握地和汉字联系起来。而且还有一些从古籍中考出的本字过于生僻怪异，或由于字词脱离关系太久，语音和词义的演变使它们很难恢复约定俗成的代表关系。在语言学的论文中分别书写一个一个的方言词自然应该尽量使用有文献依据的本字，以便观察语言的变化；但记录方言文学资料，成句、成篇的方言作品却不能一味追求本字。字是在书面上代表词（语素）的符号，代表与被代表的关系是约定俗成的。本字代表方言词迷失已久的词源，原来的约定俗成关系已经不复存在，而本方言区内通行的俗字以及方言词的俗写正是现实的约定俗成的结果。因此，记录方言歌谣，在一般条件下，当地民间通行的俗字或俗写应该优先于“本字”。例如：闽语的“宰杀”一词，俗字写作“刨”。罗杰瑞考出的本字是“治”，本义是“剖鱼”，引申为“宰杀”。“治”的这个音义在共同语中失传已久，但“治”字和普通话对应的音义现在也是一个闽方言中的常用词，如果“宰杀”也弃俗字改用本字“治”，二者在书面上就会混淆，不如仍写俗字妥当。

既无通行的俗字俗写，也没有确切的本字可写的方言词语，可以采用变通的方法，逐字斟酌，选择借用字。借用字按借用的渠道可以分三种：同音借用字、同义借用字（训读字）、读音或字形相关的字，这里不拟展开说明。总之，选择用字的原则是尽可能借字形提示关于该词（语素）的读音或义训的信息，并且尽可能避免书面上可能发生的混淆。同一个词应该尽量保持用一种写法。偶尔一用的随文附注其用字依据，多次出现的字可以在附录中列表。用汉字记录闽方言熟语歌谣资料虽然有很多困难，但绝不能因为写不出字而取巧用类似翻译的手法擅改歌谣、熟语中土俗的词语。因此，一套

标音符号是必不可少的。

三、标音

方言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不见诸书面的地方口语。闽客方言跟汉语书面语的距离很大，不论在用字问题上下了多少功夫，总有力不从心的地方。方言中字的合音、分音和丰富的语流音变都是方块汉字难以对付的。口头流传的方言歌谣用方块汉字记录总是隔了一层，那种口头文学从语音韵律上产生的审美感受总要在口头表达中才能体现出来。也许能说当地方言的读者只需根据方块文字记录的提示就可以实现从书面到口头形式的“还原”；不会说当地方言的读者则必须依赖精细的标音来做到这一点。早在歌谣研究会时期，黎锦熙先生就在《歌谣调查根本谈》中指出：记录歌谣“非有能够尽量而且尽致地表现方言的语音符号不可。若只用汉字，简直地是白费功夫”。钱玄同先生也认为，“民间文学，因为是方音方言的缘故，尤其非记音不可。最好把全文用音拼写，与汉字并列，仿佛《中西四书》那样，以资对照”。（顾颉刚《吴歌甲集》序四）

毋须赘言，“汉语拼音方案”是为北京音系度身定制的标音符号，根本无法拿来给方言注音。给方言注音的一种办法是为特定方言设计出拉丁字母的“方言拼音方案”，十八九世纪时外国传教士就是用方言拼音来编写方言版的福音书和圣歌。闽南话、客家话、福州话、福安话、莆仙话等都曾有过这样的拼音方案，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人使用了。近年来出版的某些方言词典也尝试过这种注音方式，但几乎完全不能被读者接受。从实践上看，方言拼音不难设计，能说本地方言的普通读者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方言拼音方案也不难掌握，但很难要求偶尔涉猎的读者都先花时间学习掌握这样一套特殊

的拼音系统。而且这种方言拼音符号不能达到专业工作者所要求的精确表音要求，如果必须另外为这样的拼音字母详加语音描写，实在还不如直接采用国内外学术界通用的国际音标来标音。

得力于近半个世纪以来汉语方言调查工作的成果，现在闽客各地方言大体上都有了经过方言学家精细描写的国际音标标音系统，加上直观的调值符号，能够准确地反映出方言资料的语音面貌。有了完整的注音，即使某些方言词用字选得不很妥当，也不影响资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了。

四、注释

限于笔者本人的眼界而言，总觉得历年来出版的方言文学资料注释都不够充分。即使是自己熟悉的方言，见到书面形式也觉得有几分陌生，就更不用说原本就陌生的方言了。虽然言语作品可以凭上下文猜测某些方言词语的意思。但猜测是否正确则无从核对。像闽方言、客家方言这样特殊词语较多的方言，如果不是以之为母语的读者恐怕连猜测都很困难，勉强为之，难免会出笑话。这里举一个例子：

有一本叫《古代民谣注析》的书中选了一首题为“老爷老爷，破布之遮遮”的歌谣。注曰：“老爷——指清朝官吏。破布之遮遮——破布，指官吏们穿的袍褂，千绣万补。像破布一般。遮遮，围绕之态。”“之”字无解。题解曰：“这首民谣形象地讽刺了清朝官吏，他们穿着绣袍，表面上道貌岸然，实则袍下包藏祸心。”歌谣的原文显得有些莫名其妙，注解也十分牵强，“破布”一词释为“绣袍”实在绕得太远，恐怕只是勉强的猜测。

考之于福州熟语：“老爹老爹，破布之遮遮。”福州

话的“老爹”是旧时百姓对官吏的称呼，词义相当于北方话的“老爷”。大约是哪位整理者觉得“老爹”在书面上不好理解，就擅改作同义词“老爷”了，可是这么一改后，与下句的“遮”字就不能押韵了。“之遮遮”的“之”不是文言虚词，而是借用的同音字，“之遮遮”是动词“遮”反复貌衍音变形，可译作“遮来遮去”或“左遮右遮”。从福州人对这条熟语的实际应用来看，有两层意思：一是白描，是对生活清苦、衣裳褴褛的下级官吏的善意嘲笑；一是比喻，讽刺官吏们用谎言终究遮掩不住的丑态。注释详细得当则宜然理顺。

所以说，整理好的方言资料应该详加注解，让不懂该方言的读者也能正确理解资料的内容，以免郢书燕说。整理者自己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方言歌谣（特别是童谣）中有某些词语连提供资料者也说不清是什么意思。口头传播的熟语歌谣代代相传，传唱中出现讹误，或者因方音混杂，词语更迭或社会文化背景的变迁，其中某些词语的意思变得难以理解是正常的事。“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在注解中说明一下，存疑待考，是认真负责的做法。

注释的对象是妨碍一般读者理解的方言词语，如果一句话的句法结构特殊，分别解释了方言词之后还是不好理解全句的意思，可以辅以整句的翻译，这是为一般读者编古典诗词读本的做法，可以借鉴。“以今言释古语”和“以通语释方言”应该是性质相似的工作。至于是否像余冠英作《诗经今译》那样，把方言歌谣用普通话整首翻译过来，那纯属翻译者的个人兴趣，对资料整理工作来说，不是必要的。

根据以上这些想法，我动手将历年来搜罗积累的福州方言熟语歌谣资料编成了一本《福州方言熟语歌谣》，

1998年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小册子颇受福州读者青睐，也得到了学术界同行的好评，一定程度上达到了雅俗共赏的编写目的。受到鼓舞之后，我有心以同样的方式陆续整理福建其他方言的熟语歌谣，使之形成一个系列。这个只以社会效益为着眼点的选题再次得到了福建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福建人民出版社于2000年出版了潘渭水、陈泽平合作的《建瓯方言熟语歌谣》，2001年出版了陈泽平、彭怡玢合作的《长汀客家方言熟语歌谣》，刘福铸编著的《莆仙方言熟语歌谣》，周长楫编著的《厦门方言熟语歌谣》。2006年初，福建人民出版社从保存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高度再次确认了这个选题，这套丛书将以扩大的规模分批与读者见面，已经列入计划的有漳州方言、宁德方言、龙岩方言、古田方言以及很有特色的闽东畲语等册。我们希望这项乡土文化建设项目的质量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希望学术界的朋友们可以从这套书中得到比较翔实可靠的参考资料，更希望各地的福建乡亲们能喜欢这一束我们从八闽山野中采撷来的鲜花。

新版前言

五年多前，福建人民出版社陈力凡先生和福建师范大学陈泽平教授策划组织“福建方言熟语歌谣”丛书的编写，笔者经厦门大学李如龙教授的推荐，负责撰写其中《莆仙方言熟语歌谣》书稿。几年来，尽管它只是一本不起眼的小书，但笔者仍然感到它有相当数量的读者。这些年来，几乎每年都有一些对莆仙方言感兴趣的大学生、研究生和新闻工作者等来向笔者索取小书。有些读者还来信加以鼓励。如 2003 年暮春，久居福州的莆仙籍乡亲林春荣先生，他从书市购书后，就特地给笔者寄来两首七绝，诗曰：

书市归来喜不禁，温馨满室是乡音。

先生妙手连珠玉，留与儿孙代代吟。

家山契阔梦难通，句句乡音动寸衷。

遥忆儿时明月下，齐声携手唱“拖砵”。

能得到读者的热情鼓励，笔者自是感动不已，同时亦为书中存在的一些错误和不妥之处，益增惴惴不安之感。五年前，因为其时时间比较仓促，加上笔者学力等条件的限制，《莆仙方言熟语歌谣》一书在文字方面及熟语收集的数量、取舍标准和解释的准确性等方面，均存在不尽如人意之处。因此笔者一直祈望将来能有再出新版、弥补缺陷的机会。今年，这个愿望终于实现，福

建人民出版社本着保存地域文化、支持学术、社会效益第一的原则，准备扩充“福建方言熟语歌谣”丛书，并把《莆仙方言熟语歌谣》列入再版计划。此次再版，不但重新设计版式，重新排印，而且增加篇幅，统一术语，力求踵事增华，后出转精。

四年前，笔者由原供职的福建师范大学分校调回家乡的莆田学院工作，叶落归根，使用家乡方言的机会更多了，接触原生态的莆仙乡音也更频繁了，对莆仙方言熟语歌谣的调查和相关资料的查阅也都有了更为方便的条件。因此，笔者利用此次新版机会，首先，对原书中一些文字和音标错误以及内容不妥的地方作了修改订正。第二，增补了一定篇幅的新词条和若干歌谣。第三，应出版社的建议，新版对原书中一些含有地方典故、风物传说或莆仙戏故事的熟语，增加了一些简明扼要的源流介绍，这样既可增加读者对熟语含义的理解，也可增加阅读方面的趣味性，同时对保存乡邦典故也能起到一定作用。

熟语歌谣产生于民间，流传于民间。在古代，对于方言熟语、歌谣这种下里巴人的俗学，很少有什么学者把它当作学问去注意和研究，所以基本上是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如今，许多还在民众口头广为流传的熟语，大家虽然一般都还明白其约定俗成的涵义，但却很少有人懂得其来源或出处。特别是在莆仙话地区，唐代以降，以莆仙方言为载体的莆仙戏，十分盛行，至今仍有相当的生命力。据上世纪50年代统计，莆仙戏古剧目达5000多个，剧本数量则近万本，是全国也是世界上保存古剧目和古剧本最多的地方剧种。正因为地方戏剧的盛行，许多舞台人物故事、经典对白以至于梨园轶事都转化成为方言熟语。此次新版中增补的熟语，有很大

一部分就来源于莆仙戏。不过，时过境迁，如今，在莆仙方言区，上演原汁原味古剧本的戏剧已经很少，了解传统戏剧情节的老人难以寻访，于方言俗谚、歌谣有所研究的学者更是凤毛麟角，所以笔者在解说熟语时，每每为一条熟语出处而多方求访，但仍有一些不得其详。因此，笔者尽管作了努力，但对个别熟语的来源，仍然无法完全弄清楚，语义解释也受到一定影响。总的说，莆仙方言熟语歌谣没有什么较完整的参考资料，只是上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一批莆仙老学者留下的一些零星的相关资料，可聊供参考，虽多无注释，但笔者已觉得很满足了，这些参考资料增补于书后的“参考文献”。

在新版修订过程中，莆仙戏老专家杨美煊先生对本书一些来源于莆仙戏的谚语，给了我释疑解惑的无私帮助；学长杨云鹏先生对原书中的一些不妥之处也提出过独到的修改意见。对于众师友的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另外，希望阅读新版《莆仙方言熟语歌谣》的读者，继续指瑕纠谬，用匡不逮，至祷至感。

刘福铸

2006年5月于荔城

前 言

本书包括莆仙方言熟语和歌谣两大部分。熟语部分又分谚语、惯用语、歇后语三类，歌谣部分又分儿歌童谣、谜语歌、民歌民谣、打油诗四类。莆仙方言是闽语五大次方言之一。但因为通行的范围较窄，所以它的许多异于其他闽方言的独特之处，并不为外人所知晓。在闽方言五大次方言中，莆仙方言的研究者最少，研究的成果也最少。有之，亦主要集中在语音语法方面，词汇研究很少，对含有丰富文化内涵的熟语歌谣的研究就更少了。

本书可以说是第一次把莆仙方言的熟语歌谣合并编选并附评注，也是第一次用现代比较科学的标音方法标示读音后介绍给世人。笔者希望本书能让操莆仙话的乡亲们，读后温故知新，不但勾起对故乡风物的亲切回忆，并且能引发出新的感受；也希望本书让关心莆仙文化乃至闽文化研究的所有学者，能从中得到许多有特色的民俗、方言、历史、戏剧等方面的可靠资料。

笔者对莆仙方言产生调查研究兴趣是在大学时代，至今算来已二十多个春秋，对莆仙方言研究虽然不敢说有大成就，但确实有不少体会。莆仙学者研究自己的莆仙方言，最早是从词语开始的。明代涵江人姚旅在其《露书·风篇》中考证了莆仙方言语词 40 多条。姚旅是目前已知的最早的莆仙方言研究者。明代莆田人周婴在

《厄林·增姚》中又依姚旅之例，增考莆仙方言词语 17 条。遗憾的是，有清一代，几乎没有人再问津莆仙方言研究，倒是近代的西方传教士留下了一些兴化话的罗马字材料。直到民国时期，才有一些莆仙学者开始进行一些零敲碎打式的莆仙方言研究。研究范围也由词语扩展至语音和谚语歌谣。如福建协和大学的《福建文化》1936 年第 23 期发表的杨树芳的《莆田的谚语》，1939 年第 27 期发表的朱铁苍的《莆仙语言中的古代音韵成语》。民国时宋湖民在其所著《莆田掌故见知录》书中亦收有《由华严字母论莆音与古音之关系》专文。20 世纪 40 年代出版的几种莆田报纸副刊及乡土文献，亦以较多篇幅，发表当时本地学者的莆仙方言研究成果。其中如陈燕堂先生的莆仙方言词语研究系列文章，就很有分量。特别要提及的是 1947 年马来亚《兴化文献》编委会编辑、在吉隆坡出版的《兴化文献》一书，该书不但列有“方言探讨”专栏，而且在“文艺”栏还收有《兴化的儿歌》长文。

当然，以上这些前人的研究成果，今天看来不免粗陋简单，但它们对笔者的莆仙方言研究却产生过巨大影响和起了切实的帮助。而上世纪 50 年代末莆田县志编委会编印的《莆田方言志》和近年莆田市民间文学三集成编委会编印的《中国民间歌谣集成·福建卷·莆田市分卷》则对笔者写作本书直接提供了许多材料，笔者在此谨向众先贤时俊表示由衷的感激之情。

莆仙方言熟语大部分是产生流行于民间，有很坚实的群众基础和浓厚的地方色彩。当然也有一些显然是源于书面语或移植自“官话”的，有的可能也并不怎么流行。如“一朝天子一朝臣”、“儿孙自有儿孙福”、“人穷志不穷”之类，这些缺乏方言特色的熟语，一般不在本